

江南

文化研究

首届江南文化论坛专辑（上）

—第6辑—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Jiangnan Culture Studies

江南

文化研究

首届江南文化论坛专辑（上）

—第6辑—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Jiangnan Culture Studies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南文化研究. 第6辑, 首届江南文化论坛专辑 /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077-4185-8

I. ①江… II. ①浙… III. ①文化史—研究—华东地区 IV. ①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7060 号

责任编辑: 杨 雷

封面设计: 徐徐书装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保定市彩虹艺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889×1194 1/16

印 张: 40.25

字 数: 1140千字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0元 (全两册)

编 委 会

顾 问 章培恒 章开沅
主 编 梅新林 王嘉良
执行主编 慈 波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家范 方卫平 孙 逊 吴福辉 陈玉兰
陈华文 陈国灿 胡晓明 俞樟华 高 玉
黄灵庚 潘富恩

目 录

上 册

剑与箫：江南文化精神的二重演绎	梅新林 (1)
关于地域（文学）研究的若干理论思考	蒋 凡 (4)
水乡的诗学	
——中国文学与艺术中关于“水乡”的一些美感经验	胡晓明 (19)
江南文化传统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	景遐东 (42)
略论越文化的“近传统”精神特质与意义	王嘉良 (50)
“吴越同俗”与“吴越分立”	
——试论吴越文化异同的地理和历史渊源	黄爱梅 (56)
略论江南文化的现代转型及内涵重构	
——以上海为中心	葛永海 (63)
从《古禾杂识》看江南	汪春泓 (68)
东阳人文精神的历史阐释及现代演绎	陈玉兰 (75)
廉正传四海	
——论翁心存的廉政克己及其对翁同龢兄弟的教育与影响	张 剑 (87)
用质真涤荡文明	
——论龚自珍“童心”的意蕴和意义	龚郭清 (95)
江南都市商业的文学抒写	
——以唐诗为对象	查清华 (106)
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考索	
——兼论盛唐诗人江南游历之风	查屏球 (113)
吴越文化及朝野文学的比较	
——以徐渭、王世贞为例	陈书录 (124)
吴乔诗论与江南诗学背景	蒋 寅 (128)
清代江南文学发展中的“舅权”影响	罗时进 (137)
南宋诗歌辨体理论述要	史 伟 (145)
诗僧皎然“情”论	张 勇 (162)

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隐逸特性及其对文艺创作的影响

——以常州恽寿平个案为例 许菁频 (170)

云间六朝文学风韵在浙中的传承

——以“西泠十子”的骈文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杨旭辉 (177)

“满架牙签销日月，半生心事许烟霞”

——清初钱塘女诗人徐德音及其作品论析 赵厚均 (185)

略论海盐涉园张氏家族文化与文学 沙先一 秦 敏 (194)

毕沅与乾嘉诗坛 杨 焘 (203)

《浙江潮》与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付建舟 田素云 (212)

从早期诗文看青年李叔同的观念转型 朱兴和 (219)

浙籍留学生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 王洪岳 (231)

南宋浙江禅画初探 邓乔彬 (240)

江南园林与江南士人气质 居阅时 (248)

论明代浙江戏曲的发展 龚剑锋 (254)

杨维桢与元末松江绘画 汪 涤 (264)

六朝世家大族乐舞的生产、消费及其经济关系分析 韩启超 (271)

从“爽爽风气”到“龙跳虎卧”

——王羲之书法被遮蔽的江南性 韩立平 (286)

下 册

从法眼禅系看五代时期江南佛教的发展 陈永革 (295)

晚清新式教育与浙江学子 戴鞍钢 (304)

元代温州路教育考述 陈彩云 (311)

浅论元代杭州士人的谋生与立命 姚建根 (328)

明清时期江南文士治生 徐永斌 (335)

南宋时期江南城市贫困居民的救助 陈国灿 姚培锋 (350)

乾隆十三年苏松聚众阻巢案述论 范金民 (357)

公共服务的现代化

- 江南城镇地区的交通与食宿（1912—1949） 冯贤亮（364）
- 《儒林外史》与江南城市中的饮食习俗 顾鸣塘 凌 松（397）
- 陈继儒《安得长者言》的训喻导向与晚明士风 曾礼军（408）
- “争沙”案所见明代崇明地方社会秩序 王日根 徐 枫（413）

近代江南乡村社会重构

- 与弗拉芒地区的比较分析 王 杨（Eric Vanhaute）（422）

湖州南浔金氏家族的近代变迁

- 一个丝商富户“艺术转向”的历程与原因 邵 莹（432）

守先裕后：清代江南艺文家族艺术文献建设述说

- 以平湖葛氏家族为例 丁小明（439）

略论明代江南所刊路程指南之编写体例

- 以《一统路程图记》和《士商类要》为考察中心 刘天振（448）

从公共性到地方性

- 宋代之后叶法善传说的变迁 李 震（460）

浙东地方家族与唐仲友学术的命运

陈开勇（470）

吴越徽扬：近三百年江南学术概论（一）

张 中（478）

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

- 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 蒋宝麟（502）

永嘉学派的经学思想与文章观念

- 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中心 方笑一（513）

江南地域文化与冯梦龙的经学思想

王冉冉（519）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辨订

王培军（532）

《心史》首跋作者金华冯维位考

陈福康（539）

《欧公本末》的发现及其文献与学术价值

杜海军（542）

王安石《三经新义》论衡

张 煜（548）

王寿昌及其《晓斋遗稿》

林 怡（567）

宗修《湖州府志·艺文略》引《湖录·经籍考》管窥

陈炜舜（573）

吴翌凤的《与稽斋丛稿》

王幼敏（586）

关于王国维《监本考》、《浙本考》的一些考察	丁红旗 (593)
信仰抑或研究?	
——欧阳竟无与金陵刻经处	成 玮 (604)
卓人月年谱	郎 净 (609)
清代戏曲家徐熾年谱	郝丽霞 (618)
后 记	(629)

剑与箫：江南文化精神的二重演绎

梅新林

尽管江南区域版图常常处于“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的游动之中，但其核心区域则在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区。大致以六朝为界，江南文化在从边缘走向中心以及与外来中原文化的激烈冲突与交融中，不仅出现了由武而文、由刚而柔的历史性转型，而且完成了亦武亦文、亦刚亦柔的历史性重构。在此，我特别想引用反复出现于吴越后裔、清代诗人龚自珍诗词中的“剑一箫”二元意象组合，以期对江南文化精神进行一番新的探索和重释。

清代道光三年（1823），龚自珍曾于《漫感》诗中吟咏道：“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作者有感于西北边疆与东南沿海的危机，深怀抑郁而悲愤的心情，唱出了自己仗剑从军、赋诗忧国而又无所作为的慷慨悲歌。可以说，“剑”与“箫”是频现于龚自珍诗词中的一对核心意象，比如其《湘月》词：“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丑奴儿令》词：“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秋心三首》诗其一：“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己亥杂诗》之九六：“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又忏心一首》诗：“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等等。与“剑”相联的是壮烈、阳刚、豪放……与箫相联的是灵性、阴柔、婉约……“剑”喻抱负，“箫”喻诗魂；“剑”喻狂放，“箫”喻缠绵，由此构成壮怀报国之剑气与幽情赋诗之箫心的奇妙组合。同是吴越后裔的近代诗人柳亚子一直对龚自珍深怀敬意，其《论诗三绝句》有曰：“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侠古无俦。只愁孤负灵箫意，北驾南舫到白头。”（《论诗三绝句·定庵集》）“一箫一剑”，由两位具侠士风采的近代江南志士所体现出吴越文化的好剑轻死、血族复仇的尚武精神原型——“剑”的精神，与江南文化的另一种精神——“箫”的精神的组合，诚为深入探索两位诗人隐秘心曲的核心标识，同时也有助于更好把握和辨析江南文化精神的二重演绎。

从基于时空而又超越时空的多维视角观之，“剑”与“箫”——江南文化精神的二重演绎，主要呈现为先“剑”后“箫”、南“剑”北“箫”、内“剑”外“箫”三种形态。

一、先“剑”后“箫”：江南文化精神的历史演变

江南文化发源于吴越文化，最初是由南方“百越”族的吴、越两个部族所创造的一种土著文化，其先“剑”后“箫”的历史演变，与两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有关：第一个时间节点是春秋时代。吴、越与诸国

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征战，终至跻身“春秋五霸”行列，这既是始于西周的吴越列国文化迅速崛起并结出辉煌成果的重要标志，也由此确立吴越文化重剑轻死、血族复仇的尚武精神——“剑”之精神核心。无论是吴王夫差的不忘杀父之仇，三年报越，还是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复仇雪耻；无论是侠士专诸、要离的视死如归，勇赴死难，还是关于“吴王金戈越王剑”的种种记载与传说，都将吴越人士重剑轻死、血族复仇的尚武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从春秋时代吴、越国铸剑业的高度发达来看，隐藏在其背后的也是民风的强悍与好剑轻死的尚武精神，因为铸剑业的发达既需要精湛工艺的支撑，但更需要民风好尚的激励。至于伍子胥、孙武、范蠡、文种等杰出军事家、谋略家汇聚吴越，为后世留下《孙子兵法》以及诸多军事经典案例，更是吴越文化尚武精神的体现。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六朝时期，由“永嘉之乱”而引发的北方移民大浪潮的兴起，以及随后的晋室南渡，建都建康，中国文化轴心首次出现南北转移。在由吴越本土文化与中原移民文化的交融与重建的过程中，源于吴越文化的江南区域文化出现了由武而文、由刚而柔的重大变化，也就是由“剑”而“箫”的历史性转型。陈正祥尝谓西晋末“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末“靖康之难”，为逼使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①。如果说第一次波澜标志着由古老吴越文化催生和发展为新型江南文化，以及“剑—箫”精神历史性转型的初步完成，那么，其后的两次波澜即是沿着这一方向不断向前推进，至南宋之后终成定局。

二、南“剑”北“箫”：江南文化精神的空间差异

在江南文化精神亦“剑”亦“箫”的二重演绎中，与时间上先“剑”后“箫”的历史演变相呼应，在空间上则呈现为南“剑”北“箫”的地域差异。

吴与越作为“百越”的两大支系，地理相邻，语言相通，文化相融。《吕氏春秋·知化》云：“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云：“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越绝书》亦云：“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故而后人以吴、越之文化并称为吴越文化。然析而言之，比较南越北吴的地域特点，越地多山，相对封闭；吴地多水，相对平坦，所以吴地民风稍显平和，而越地民风则更为强悍。再就与中原文化关系而论，北吴较之南越与中原地缘更近，也更易受到中原文化的辐射与影响。周时古公亶父之子泰伯、雍仲之所以选择奔吴而非奔越，显然是基于地缘与文化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而此事反过来又给吴地文化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东汉吴郡太守麋豹《泰伯墓碑记》赞曰：“数年之间，人民殷富，教化大治。东南礼乐，实始基焉。”公元前544年季札奉命使鲁，在鲁国观乐所显示的非凡音乐素养，更是吴国与中原文化互动相融并深受后者影响的典型表现。由吴观越，越地无论在地缘还是在文化上都更远离中原文化，《吕氏春秋·遇合篇》载：“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又据《越绝书》载：勾践迁都琅琊后孔子曾往谒见，为述五帝三王之道，勾践以俗异为由辞谢之。这说明越国更注重本土文化，也更坚守自己的土著特色。所以相对而言，吴文化较之越文化更多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也昭示着后世吴越文化精神中的同中之异。在亦“剑”亦“箫”的二重组合与演绎中，吴“箫”多于“剑”，而越则“剑”多于“箫”。

三、内“剑”外“箫”：江南文化精神的共性特点

无论是时间上的先“剑”后“箫”，还是空间上的南“剑”北“箫”，就江南文化精神的共性特点而

^①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

言，最为核心的是内“剑”外“箫”。

从春秋到六朝时代，江南文化精神在完成由“剑”而“箫”的历史性转型之际，也同时实现了内“剑”外“箫”历史性重构。所以表面看来，是“剑”一变为“箫”，由“箫”取代了“剑”，但实际上，则是“剑”的价值分化，是内“剑”外“箫”的精神重构。因为尽管六朝时期江南文化发生了由武而文、由刚而柔的重大变化，但发源于远古吴越本土文化的重剑轻死、血族复仇的尚武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基因与原型，伴随着阖闾、夫差、勾践、伍子胥、孙武、文种、范蠡、西施、专诸、要离等历史主角与故事，依然代代相传，未尝中断。尤其每当社会变局之际，这种尚武精神基因与原型就会被迅速激活而迸发出耀眼的光辉。六朝时期从吴越文化到江南文化的精神演变，更多是在亦“剑”亦“箫”的二重组合与变奏中，集中表现为内“剑”外“箫”的共性特点，只是因人因时，形态各异，或隐或显，或微或宏，或弱或强；或偏重于“剑”的精神，或偏重于“箫”的精神，或彼此和谐相融。

徐茂明先生阐释吴文化的“外柔内刚”，即是在儒雅外表之下隐含着更深沉更强烈的“刚”的文化性格——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执着追求；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在政治腐败、国是日非的年代的热情；在经济领域中的开拓进取精神；等等。^①的确，暂且不论东林、复社文人群体的前仆后继、反抗专制的铮铮铁骨，即便如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等江南才子，也是华艳其外，傲骨其中，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反权威意识。此乃内“剑”外“箫”、似“箫”实“剑”也。在越文化中，源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血族复仇的尚武精神基因更为活跃，也更为强悍。尤其是在近代古越绍兴，蔡元培、章炳麟、徐锡麟、秋瑾等一批光复会中坚组织秘密暗杀、武装暴动以及其他方式的反清斗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来自江南的陈独秀、鲁迅等皆以笔为枪，成为杰出的反封建斗士，陈独秀既在上海参与了蔡元培、黄兴用于秘密暗杀的制造炸弹活动，又为洗刷“东亚病夫”之名，大力倡导“尚武精神”。所有这一切，应主要归因于特定时代风云的激励，但也同样可以隐约听到远古吴越尚武精神的回响。

在本文的最后，我想再从古今、中外互观的双重视点引入两个颇有趣味的案例作为佐证：一是束景南、姚诚将吴越文化归结为“激烈”与“冲淡”两种不同的人文精神，认为鲁迅与周作人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作为在相同环境、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同胞兄弟，由于个性的不同，造成了他们对吴越文化中“激烈”与“冲淡”两种不同人文精神承传与吸收的差别，由此形成了其为人、为文的迥异。^②此例正与江南文化精神亦“剑”亦“箫”互相印证，是得益于古今互观的创新成果。二是美国人类文化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剑》一书中以“菊”与“剑”概括日本民族文化精神，曾引起日本学界以及世界人类学界的广泛关注。诚然，在日本文化“菊”与“剑”和江南文化“剑”与“箫”精神的二重组合之间，原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更不能简单将此两者划等号，但考虑到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彼此地缘上的邻近因素，则若以中外互观的特定视点，比较“剑—箫”与“剑—菊”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同样可以从中获得诸多启示。

作者简介

梅新林，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① 徐茂明《论吴文化的特征及其成因》，《学术月刊》1997年第8期。

^② 束景南、姚诚《激烈的“猛士”与冲淡的“名士”——鲁迅与周作人对吴越文化精神的不同承传》，《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关于地域（文学）研究的若干理论思考

蒋 凡

一、地域文化（文学）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新的交叉学科，研究者要有通感体悟之精神

最近，有关地域文化（文学）研究成了热门话题，如江南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江淮文化、甘陇文化、楚文化、蜀文化、晋文化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热闹之中，能否有所突破与开拓，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现谈点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

有关地域文化研究，因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人们考察的视角各异，所以尚未形成某些学术规范与共识。地域文化研究领域，涉及诸多学科，包括了地理学（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文学、文化学、历史学、人口学、语言学、神话学、人类学、方志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与经学史学等交叉迭现的相关学科。而各个领域的学者，又各有其专业视野，既有其不同于他人的学术优势，同时又为专业视野界域所限，形成了一定的观察与思考的盲点或误区。如研究地理学者，重在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对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在上古时期，自然环境的优与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但随着时代科技生产的进步，以及人类认识自然水平的提高，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力发生了变化，“制天命而用之”及“人定胜天”之论，打破了人们对于自然神圣的盲目崇拜。地理环境的文化影响，日渐降低。因此，视地理环境为地域文化研究舞台的核心主角，就不一定妥当。地域文化研究，不仅要注重地理条件，更要重视立足于天地之间的人类，天、地、人这“三才”之中，人处中心位置。特别是人类内在心灵的发展轨迹，这就不是唯地理论者所能概括的了。地域文化，顾名思义，当然与地域即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但是，“地域文化”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词组，实际上，“地域”后应加“的”，是“地域的”之省略，是修饰后面的名词“文化（文学）”的，这才是真正的主语。文化属于人类的主动行为，它虽受地域空间的制约，但是，文化（文学）的发生、发展，不仅在横向的地域空间中发生存在，而且在历史纵向的发展中，形成其各地异趣的独特规律。因此，地域文化研究，固然必须顾及地理环境等空间条件，但却不可固守唯地理论，而应广开视野，广泛涉猎地理之外的诸多交叉学科，才能对地域文化研究作更深入的本质认识。

至于研究文化（文学）的学者，也可能因其专业嗜好而另具偏向。他们常是撇开相关交叉学科，就文化论文化，就文学论文学，热情、兴奋而忘却其他相关交叉学科的相互影响与彼此制约。吾师朱东润与郭

绍虞先生曾说，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不能孤陋寡闻，就事论事。如果仅仅是就文学论文学，眼光狭隘，肯定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甚至可能连做个合格的中文系的学生都有困难。比如司马迁《史记》，不仅是史学和文学著作，如读其十《书》，称司马迁为天文、地理、经济、民族学家，也一点不为过。因此，文化或文学工作者，要广开眼界，跳出本专业的小天地，而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作新的地域文化探索。

当然，与地域文化研究相关的交叉学科很多，想要面面俱到而成为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不仅不可能，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能让人望而却步，知难而退而放弃学习和研究。但是，如若是对某些相关学科略有所知，这并不难，则人们对于文化现象或作家作品的感悟就会增添许多感触点，一点就悟，悟而有解，解即通透，从而为新的研究突破作出贡献。现以方言方音为例。比如语言学中有语音学，语言、语音是时间的学科，与地域研究的时空学科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方言方音的运用就与地域文化研究密切相关。比如福建省的文化与文学，在南宋至近代都很发达。如北宋书法四大家中的蔡襄，就是福建莆田人。他曾在泉州海峡中主持修建了著名的洛阳桥，闻名于世，现有《蔡襄集》传世。南宋著名诗人、诗论家刘克庄也是莆田人。明时诗坛有闽中十才子之称；清代出了林则徐等大政治家、改革家，李光地、陈寿祺、梁章钜这样的大学者。可见福建文化发展之一斑。但在小说创作方面，却是几乎寂无声息，除了近代魏子安（名秀仁）《花月痕》及林纾的翻译小说外，从古到近代，小说名著名篇几乎等于零，这是为什么？就是魏子安《花月痕》，他虽是闽之侯官人，但他多次考进士落榜，外出游幕，其小说《花月痕》，是他在当时山西太原知府保眠琴幕中所作，保知府很感兴趣，每写一回，即酬五十金以资鼓励，半年后终于成书，见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第一册所载。又林纾的《蠡叟丛读》一类的文言小说，也是他居京时为论战而作，这些小说创作，都是以普通官话为语言载体，而与闽方言无关。古代真正的通俗小说创作若要在闽省流行，就必须以普通百姓为读者对象，而普通百姓讲方言而说不说官话，所以就必须要运用闽方言来写作。恰如陈庆元先生所分析：“究其不发达的原因，或许与闽地方言（中国七大方言区，闽居其二；即使闽方言，福州、莆田、闽南、闽北也是五花八门，并不相通）有关。小说毕竟属于俗文学，中国的语文本来就存在语与文不相一致的特点，再加上复杂的方言，希望小说在古代闽地拥有太多的读者并不现实。”^①福建省西、北、南三面环山，东临大海，古时交通不便，人们聚落而居，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势，因而各有各的方言。我是泉州人，从泉州往北过惠安县，相距不足百公里的莆田、仙游二地，方言大变，不与闽南方言相通，根本听不懂而无法用方言来交流。如果是用泉州闽南方言来写小说，莆田、仙游的人看不懂、听不懂，更不用说福清以北的人了。方言方音的隔阂，使俗小说的对象大大缩小了范围。俗小说的创作，近乎商业操作，缺少读者，犹如商品市场萎缩，商品少人问津，能生存发展吗？于此可见，方言方音直接影响了地方文学创作及文化传播。

又如中国古代中古音中的入声字的问题。自元蒙进入中原以后，南来北往异国他乡的民族语言语音，也在人员的相互交流中进入中原，因此中原语音一变，入声字消失。这反映在元周德清著《中原音韵》中。周氏根据当时在演唱中获得成功地北曲作品——实际上就是根据当时北方相关的方言、方音，掌握其规律，共分十九韵，每韵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部分。后来，这部《中原音韵》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音韵之作，对近代“官话”（通行全国的普通话）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与贡献。但唐诗宋词所处的是中古音时代，其用入声字写诗填词，读来很有特点，煞是动听。那么人们要问：在元代《中原音韵》以后，原有中古音中的入声字，又到哪儿去了呢？实际上是“入派三声”，原有入声字在北方话中，被分派到平

^① 陈庆元《文学：地域的关照》，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13页。

声、上声、去声中了。今天，北方人在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方面的掌握，优于南方人，但却对中国古代语音中的入声字，难以把握。而读不好入声字，对古代诗词音乐美的审美能力，就会丧失一大部分，实在可惜。而今天的南方人，讲普通话容易产生很多毛病；但对古代诗词中的入声字之美，反倒是易于理解和把握。因为中古音中的入声字，很多保存在今天的南方方言中，如吴语、闽南语和粤语、客家语中。为什么呢？大概与古代战乱、人口迁移有关，如东西晋之际的永嘉南渡，唐代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南北宋之交的靖康之难，中原士人大量南迁。比如泉州有晋江县，传说即晋人南渡进入泉州地区聚居之所，因而泉州闽南方言，保存了较多的原来河南一带中原士人的晋、唐方音，我们只要细读《世说新语》，就会有所发现。如筷子称“箸”，沙锅称“埕”，指甲称“爪”，稀饭称“糜”，都可以在闽南方言中得到印证。

又如唐孟浩然《过故人庄》诗曰：“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如用今天的普通话来朗读，“家”、“麻”、“花”与“斜”并不押韵，失去了诗歌的音节流畅之美。但是，如果用今天的闽南话来朗吟，则全都合乎韵辙，朗朗动听而有贯珠之美。为什么？因为闽南方言保存了古音，古时“家”、“斜”、“麻”、“花”同属下平声的麻韵。用闽南方言来吟唱唐诗宋词，在诗词的音乐美方面，就具有了天然的优势，获得更多的审美享受。为此，厦门大学著名的语言学家黄典诚教授写了一篇《晋唐古语在泉州》的文章说：“如果……李杜复起，则年年元宵，二老前来参加开元寺的诗会，和泉州的耆宿此唱彼和，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①由此可见，懂点音韵学方言学，对地域文化研究中的艺术感悟能力是大有助益的。如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闭口韵问题，据《世说新语·雅量》第29则故事载，东晋大将军桓温在宴会上埋伏甲士，准备杀掉来赴宴会的政敌谢安和王坦之等名士。“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书咏，讽‘浩浩洪流’（按：嵇康诗）。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据刘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学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当东晋中期，司马南渡已过半个世纪，两晋故都洛阳早陷胡骑之手，而谢安尚能保持昔日洛阳之音来歌咏诗歌，因其语音重浊，多闭口韵，恰好谢安患有鼻疾，故语音重浊的特点尤为突出，从而成功展现了昔日洛生咏的风采。后来诸名士仿谢之咏，因时、地两隔，少重浊之闭口韵，故而用手捻鼻而助其吟，与谢相较，形虽似而少自然之神韵。但从此，谢安的洛生咏成了昔日诗坛的一种新流行。现今闽南方言就保存了相当多的闭口韵，不必如当日名流掩鼻而吟，如“张”字用闽南话来读即是典型的闭口韵。如果我们略知音韵方言常识，一点就悟，再来读《世说新语》中谢安作洛生咏的故事，就会感到绘形摹声，如在目前而倍增兴味。谢安之洛生咏，不仅关乎南、北方音变化，更可见出昔日文坛的流行色与新趋势。于此可见，音韵方言之学，略知一二常识，有助于地域文化研究中的古、今对话，并促进了研究的发展深入。

二、要注重时、空的矛盾对立、关联转换以及相互依存的关系

世界是由时间与空间构成的，如果没有了时、空，那么世界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地域或地理，是无形时间历史的空间存在形式；而人类历史的时间流驶又必须在具体可感可触的空间地域中实现。时、地二间，虽有无形抽象与有形可感的虚与实之别，但二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地理是时间的空间属性，历史是地理的时间属性，地不离时，时不离地。若时、地两分，则时、地俱丧而失去意义，成了纯然虚幻的世界。在世界上，没有时间的空间，或是没有空间的时间，都是荒唐的呓语狂想。因此，在地域文化研究中，必须全面关照时、空而不可偏视。时、空二间，相较而言，空间的地理因素是相对稳定的，其生存与发展

^① 见王建设《〈世说新语〉选译新注》（附泉州方言证）称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多处“静”的状态；而时间因素则是流动变化而永无止息，生、老、病、死，生生不息，如此而已，属于“动”的状态。时间流变构成历史，空间存在构成地理环境；历史发展流动不居，稍纵即逝，其性偏“虚”，难以把握；而地理山川及其疆域则相对稳定，其性偏“实”，可看，可感，可触，易于引发人们“感物起兴”的想象与思考。时、空之“虚”、“实”关联与转换，皆为有关研究思考之需要。地域文化研究，眼光不仅要注目于地理环境之“实”，同时更应重视地理环境所无法摆脱的历史流变之“虚”，动静虚实必须辩证统一而完美结合，才能为地域文化研究打开新思路，开拓新局面。具体说来，必须注重时一空、动一静、虚一实、纵向历史运动一横向空间地域生态发展变化，诸多因素交叉重迭，辩证统一，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在永无休止的历史动态的广阔地域环境中，构建并展开了人类文化生态的多维立体网络。

比如春秋战国以前的秦文化，当然离不开秦民族所聚居的关、陇之地。俗语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班固《汉书·地理志》曰：“民含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秦民族文化性格与精神的形成，当然与秦人所居关、陇之地的一方水土风气的自然环境直接相关。但是，先秦秦民族所居的关中沃土，又是怎样来的呢？它原来是周人所居之旧京，而非秦人所有。据《史记·秦本纪》载，周幽王无道，“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郿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伐戎而至岐，卒。……（襄公子）文公十六年，初有史纪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①于此可见，关陕丰岐之地，原非秦有，而是周人故都。秦人原非周朝诸侯，秦襄公救驾力战犬戎，又以兵护周平王东迁。因功封为诸侯，并赐以被犬戎所侵占的关中岐丰之地，让秦人自己在战斗中从敌人手中去夺取。于是秦襄公、文公几代力战，逐犬戎，遂占岐、丰关中之地，并“收周余民有之”。对于秦人国力来说，人口和土地一样重要，生产要劳动力，作战要兵力，更何况原来周之余民是文化素养高于秦的文明先进者呢？这一新的地域人口因素，对于今后秦国的发展壮大，大有助益。在短短的数十年中，关中之地的自然环境并无明显改变，但却因战争而三易其主（周一犬戎一秦），在历史的流变中，关中的人文生态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周属礼仪文明之邦，犬戎则纯是游牧民族文化，而秦文化则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同一地域，在时间的流动中发生了实质性的面貌改变。时间的历史对于地域文化的影响，岂可轻忽？进占岐、丰之地以后，因秦“收周余民有之”，秦人与周之原住民产生了文化交流，矛盾冲突，碰撞融合，逐渐孕育了新型的秦文化。这只要仔细读秦刻《石鼓文》^②就可清楚明白。《石鼓文》中的诗歌，不仅与《诗经》中的风诗相关，更有与雅、颂相近者。证明秦诗与中原文学的密切关系。于此可见，在新时期中，原住民的周民族礼仪文明，对秦地秦民族文化的巨大影响。后来的秦文化，就在时空交叉碰撞与转换中汇合成了一股新潮流，比如战国时秦国所构建的法家重视耕战的文化品格与精神，就与东、西周之际秦人的迁徙关中之野有关。两周以前，秦民族地处我国西北，其先祖“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③。犬丘之地在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南，与犬戎杂处而居。又班固《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云：“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尚上（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而至今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考《诗经·秦风》及出土秦刻石鼓文，多言“车马田猎”之事，自是适应环境之自然。秦民族与羌胡戎狄

① 二十四史标点本《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一册第179页。

② 战国时秦刻石鼓，在陕西凤翔出土，原有十座，距今二千七八百年，因年代久远，若干刻文埋磨损坏，今仍存刻文数百字，其篆书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每座石鼓上刻猎碣一首，类似《诗经》四言诗体，明显受风、雅、颂诗之影响。出土石鼓文物，今存北京故宫。

③ 见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诸西北游牧民族交叉杂处,为了生存与发展,不得不然。故秦之风俗文化,在重视战备方面,与游牧民族相近。但与游牧民族不同,秦民族另有重视农耕文明的一面,这一点与周民族等中原文化有相通之处。说起农耕社会的传统礼乐文明,原非秦人本性,而是在其占据关中丰、岐之地礼仪之邦后,原先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生活,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要,在古代严重的民族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毫不留情。战争不仅要依靠勇力,更要有强大的民族经济作支撑。秦人要在频繁的战中立脚,就必须发展经济,而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远远不能适应富国强兵的战争需求。这就逼迫秦人不得不主动向周人学习更为先进的农耕文明,逐渐过渡并转向农业社会。恰好,关中丰、镐,原是周人旧京,农耕文明的礼乐制度,有一定的承传与发展。因此,秦占关中之后,就有了完成这一经济转型的条件,秦人即向当地“周之余民”学习农耕,广开阡陌平整田地,修灌溉渠大兴水利,农业文明大大提高了秦人的民族文化素养和经济实力。后来战国时的秦人,就是依靠关中强大的农业经济文明的支撑,开关延敌,四出攻战,终于扫平群雄,一统六合,第一次统一了中国,为中华文明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这是秦民族“耕战”文化的一次胜利实践。事实说明,秦民族的文化品格,是在时、空的交叉作用下变化、凸显出来的。在具体的秦文化(文学)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其动、静、虚、实的矛盾对立与转化,无不鲜活生动,令人目不暇接,颇多启迪而促人深思。

三、地域文化(文学)生命活力的强弱与发展,与挑战与应战的文明观念密切相关

在具体的地域文化研究中,挑战与应战的文明观念很重要。历史文明的炽热岩浆,在地下冲突、碰撞,冲决旧的框框,焚烧旧的枷锁,在历史的运行变化中开拓、开放,逐渐形成了新的地域人文生态,影响了新的地域文明的诞生与发展。比如远古冰河时期,原始人类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洪水滔天,四处泛滥,故西方有创世纪的诺亚方舟之说,中国也有“女娲补天”的上古神话,据《淮南子·览冥训》曰:“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下兼覆,地不周载。火熒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人类被洪水围困,生存条件极其恶劣,怎么办?是毫无作为地坐以待毙,还是积极抗争应战,另觅新的生机以自我挽救?许多哀叹等待、逆来顺受者当然被自然淘汰,走向了毁灭;而抗争的人类则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推动了文明的新生。“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按:指中原地带)平,狡虫死,颛民生。”^①通过虚幻的神话世界,展现了远古人类的理想,看到了中华先祖直面艰难困境而勇敢抗争应战,终于跳出了坎陷之溺,创造了新的一线生机。如《山海经·海内经》所载:“洪水滔天,鲧窃(天)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这虽然是神话,但却是人类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而汉代的司马迁则以历史家的眼光来看问题,他在《史记·夏本纪》中,根据古代图籍及传说史料,曰:“当帝尧之时,鸿(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命鲧治水失败,舜“乃殛鲧于羽山”,并举鲧子禹继续治水事业。于是禹接班后,“命诸侯百姓徙以傅(敷)土,行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之功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终于导河水入海,平息洪水而万民以生。这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对于大自然的挑战,如果因父鲧治水失败致死而不敢应战,能有大禹治水的巨大成功吗?他能开创夏朝数百年的江山基业吗?历史中夏禹治水的故事,实际上对于勤劳、勇敢、顽强斗争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对于地理环境的自然灾害,只是一味地恐惧、畏缩,逆来顺受,坐以待毙,还能产生古代中华文明的生存、发展与辉煌吗?人类文明

^① 刘安《淮南子·览冥训》。

是在经历了四次冰河时期的大劫难后形成的，并非偶然。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亚诺尔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二部中就有“逆境的美德”一节，按其标题原文，意谓“美是艰难的”，或“优秀需要苦难”^①。汤因比曾称引迈尔斯《希腊人是谁？》中的话：“如果说‘需要’是发明之母，那么它的父亲便是‘顽强’，就是你在困难环境中坚决活下去的决心，绝不承认失败，另觅安适的生活。我们知道，文明是在四次冰期时候，气候、动物和植物的特征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开始的。这绝不是偶然的事。在森林条件减退的时候，刚刚可以维持活命的原始人类在自然规律的安排下保存了他们的原始性，可是却放弃了他们征服自然的胜利。那些取得了胜利的人，变成了真正的人；在没有树木可以巢居的时候，他们就站在平地上；在果子没有成熟的时候，他们就食肉度日；他们宁肯取火、制衣，也不肯追逐阳光的温暖；他们守卫他们的洞穴，训练他们的后代，设法在这个好像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世界里找出个道理来。”^② 人类文明的诞生与发展，来自于挑战与应战，不仅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如此，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亦是如此。严酷自然环境的逼迫挑战，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最为有力的催生剂，敢于应战并能有力应战，产生了人类文明的新进步。而那些贪图安逸而“追逐阳光的温暖”的懒人，很可能因其不敢应战而从地球上消失。由此可见，人区别于动物，人是有智慧有劳动能力的，面对挑战，敢于应战，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给人以影响和制约，但是，人类因应形势，同时也给自然力量以有力的反馈。人类创造了文明。

当然，如果人类坚持“人定胜天”的理论，始终把地理自然环境作为敌对面的总攻略，一旦反应过激，不去思考人与自然关系中更为重要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和谐的另一面，如果没有地球母亲敞开宽广的胸怀去“厚德载物”，没有用自己丰富的乳汁去哺养万物，能有今日的人类文明吗？但自人类进入工业甚至是后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开始暴虐自然，在自己的地域中，恨不得在每块石头中都压榨出石油来，这样无限制地掠夺，而不去作相应补偿和回报自然的行为，必然破坏自然环境，一定会引来自然环境的严重报复。比如地球广大的绿色植被破坏，森林的滥伐，长江、黄河等母亲河的呻吟咆哮，洪水泛滥，大气臭氧层的极大撕裂形成巨大空洞，水生物圈的严重污染，自然环境一旦受不了而发脾气，人类受得了吗？

因此，虽然挑战与应战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但它是有条件、有分寸的，必须妥善处理“天人合一”与“人定胜天”的关系，要有一个对矛盾发展的辩证认识。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天人合一”的观念重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环境资源的开发应用较为温和缓慢，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以前，曾把中国古代文明推上了世界峰巅；但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中，却明显落后了一大步，因而常是被动挨打，受西方大国侵略欺侮。而“人定胜天”的观念，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人类可向地球母亲实施暴虐压榨而无须保护回报，人们无限爆炸性地掠夺开采大量的非再生能源（如石油、煤炭、核矿等），大大超越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因而受到了地球母亲的教训和报复。为此，时下已有西方学者在提倡“回归东方哲学”、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的一面，人类的文明发展，必须借助自然，保护环境，与“天”和谐共处而同步发展。在我们的地域文化研究中，这一点必须关注并予理性的评判。

四、在地域文明舞台中，应特别关注土生土长的本地原生态文化与外来文化 或移民文化的矛盾冲突、交流碰撞与重新融合的新发展和新趋势

开发地域文化，在今天已成热潮，这大概与招商引资及开拓本地旅游资源有关。但仅仅从商业的角度看文化，虽然合法，但却是不够的，文化自有其深刻内涵。为了追逐商业利润，片面夸大保护、开发本土

① 见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

② 见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